

有效的全球化与无效的全球治理

——新冠疫情背景下西方学者的新思考

凌菲霞

[摘要] 新冠病毒在全球快速传播并造成巨大破坏的事实引发西方关于全球化的激烈辩论。虽然新冠病毒作为无国界疾病被视为全球化的负面作用,但是西方大多数评论都没有停留在将疫情失控直接归咎于经济全球化的层面上,而是分析出疫情失控背后一些国家决策不当和国际组织治理失灵的根本原因,并在公众沉浸于全球供应链崩溃、医疗短缺及其对国家主权的威胁的错愕乃至恐慌中指出经济全球化不会与国家经济自主能力、抗疫能力乃至国家主权形成冲突,反而是增强了这些能力和国家主权,从而有力地经济全球化辩护。同时,西方尤其强调经济全球化的巨大规模及其带来的全球性问题与全球治理水平的不匹配,有效全球治理的缺位无法巩固和保障经济全球化的成果,当前国际组织的治理失灵、反多边主义的兴起都不利于全球的抗疫行动,无法使全世界共同战胜新冠病毒等全球性难题。要使全世界成功走出疫情的阴霾并以良好的准备状态应对未来的全球性挑战,则迫切需要实现有效的全球治理。

[关键词] 新冠疫情;经济全球化;国家主权;全球治理;反多边主义

[中图分类号] D815

[文献标识码] A

DOI: 10.13654/j.cnki.naf.2020.05.005

[文章编号] 1003-7411(2020)05-0063-(13)

[收稿日期] 2020-06-25

[基金项目] 2016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16JJD710015);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67批面上资助项目(2020M673034);2020年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青年教师培育项目(20wkpy102)

[作者简介] 凌菲霞,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所、哲学系暨实践哲学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哲学博士。(广州 510275)

新冠疫情在全球蔓延之时,西方不少人都觉得,人和商品的自由流动曾是繁荣的主要驱动力,但如今却变成了可能毁掉无数人的生活的洪水猛兽。全球化以及并不昂贵的便利交通运输是新冠病毒在短短几个月内传播到世界上几乎每个国家的主要原因。^[1]此外,新冠疫情对全球供应链的破坏及其引发的西方医疗短缺问题也使西方沉浸在全球化与国家主权和自决之间关系的激烈讨论中。西方媒体甚至出现了新冠疫情是否会成为全球化的丧钟或压倒全球化的最后一根稻草的热议。

NORTHEAST ASIA FORUM

众所周知,对世界上大多数国家而言,全球化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在过去的20年中,仅在中国,就有数亿人摆脱了最严重的贫困。这次疫情会对全球化的命运带来什么样的冲击,牵动着无数人的心。同样地,西方世界对新冠疫情与全球化的关系有着怎样的看法,也是值得关注的话题。笔者发现,虽然西方不乏批评全球化的激烈言论,但是不少冷静的分析都放弃简单的指责,认为疫情失控有更为复杂深层次的原因,也对抗疫引发的国家主权与经济全球化关系问题进行剖析,从而为经济全球化提供重要的辩护。此外,这些分析也反思了全球治理的现状,认为疫情失控、抗疫之曲折与有效全球治理的缺位密不可分。

一、新冠疫情与经济全球化

西方不少人将新冠大流行理解为全球化过热、旅游业和人员流动性迅猛增长的直接结果,将批评的矛头直指当前的经济全球化进程,即自20世纪80年代发展至今的全球化阶段,其中1990年至2008年还常常被称为“超级全球化”时代。^[2]究竟广泛的全球化、最近几十年的经济全球化与新冠大流行有什么关系?当前的经济全球化是否应为新冠病毒的全球肆虐负责?要回答这些问题,就要先分析新冠肺炎等无国界疾病的传播实质以及新冠疫情不受控制的原因。

(一)作为全球化负面结果的无国界疾病及其传播实质

从全球化的历史来看,疾病的跨境传播是全球化的不良副产品。较早期的全球化可以追溯至中国的古丝绸之路、明朝的郑和下西洋等,而从欧洲的角度来看,哥伦布(Columbus)发现新大陆的首次航行(1492年)和达·伽马(Vasco da Gama)的首次印度之旅(1498年)标志着全球化的开端。^[3]然而,达到前所未有规模和速度的全球化还是过去几十年里的全球化。跨越国境的人员接触、贸易和旅行为疾病传播带来了机会:中世纪“黑死病”通过乘船的老鼠传播;哥伦布发现新世界后,普通感冒乃至天花等疾病就从“旧世界”传播到了“新世界”;“一战”后的西班牙流感全球蔓延等。^[4]美国社会学家乔治·里策(George Ritzer)指出,无国界疾病近年来已变得越来越普遍,也传播得越来越迅速,瘟疫、疟疾、结核病和性传染病等疾病已遍布全球。疾病在全球的传播速度尤其受到人们日益增加的流动性的影响。^[5]⁽⁴⁰³⁾然而,无国界疾病的传播范围和破坏性影响等传播实质上并不是由全球化过热与否来决定的。曾为法国总理内阁成员兼政治科学家的杰拉德·格伦伯格(Gérard Grunberg)所领导的泰洛斯智库(Telos)指出,即使没有如今发达的旅游业和广泛的流动性,疾病大流行的传播范围和影响似乎都不见得减少:1918~1919年,航空旅行很少,然而,随着美国军队穿越大西洋抵达欧洲或强制劳工从印度次大陆返回家中,西班牙流感在全球范围内传播,在1918~1920年间可能造成7000万人丧生,当时也远没有如今这样的全球经济联系。如今的全球化可能使新冠病毒传播得更快,但是在中世纪,鼠疫的缓慢传播并未阻止它造成巨大的破坏。^[6]不应忘记的是,如今的全球化、工业化和现代化反而使人们有更先进的技术和更丰富的资源来对抗各种疾病。

(二)新冠肺炎作为无国界疾病不受控制的原因

首先,全球化并不是新冠疫情在一些国家不受控制的原因,高度融入全球化的国家并不一定就难以控制疫情。泰洛斯智库指出,目前没有证据表明,融入全球化的程度是各国/地区

抗疫效力大小的决定性因素。例如,已高度融入全球生产链中的韩国(经济外向度为40%左右),在现阶段似乎能够从根本上遏制新冠病毒的流行,或者至少可以有效地降低流行速度,比在经济上更为自给自足的美国(经济外向度为11%)好得多。同样,似乎没有任何迹象表明,经济十分开放的德国(经济外向度为30%以上)在应对这种大流行时要较为逊色。^[6]再者,德国著名日报《商报》(Handelsblatt)驻亚洲记者弗雷德里克·斯波尔(Frederic Spohr)和全球创新中心(Global Innovation Hub)负责人阿尔敏·雷纳兹(Armin Reinartz)共同指出,越南已经很好地融入了国际供应链,但这种病毒在越南几乎被根除了。^[7]

其次,有较多的证据表明,全球化不是新冠疫情失控的罪魁祸首,真正的原因是一些国家领导人对疫情的轻视和对专家意见的忽略以及国际合作的不足。耶鲁杰克逊全球事务研究所(Yale Jackson Institute for Global Affairs)的研究助理汉斯·悦·朱(Hans Yue Zhu)在耶鲁大学的杂志《耶鲁全球在线》(YaleGlobal Online)里撰文列出了这方面的证据:世界卫生组织(简称世卫组织)于1月30日宣布全球紧急状态,但许多国家领导人并未做好准备。世卫组织采取了许多措施来遏制该病毒传播。2月11日,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盖布雷耶苏斯(Tedros Ghebreyesus)认为这次疫情对中国以外的其他地方也是“严重威胁”,并在2月20日发出另一警告:“该病毒非常危险,是头号公敌。但它并没有受到足够重视。”媒体和全球卫生官员发布了关于新冠病毒的威胁性以及大量无症状感染者仍具有传染性的预警。尽管有中国和意大利遭受苦难、封锁的景象,但许多领导人仍认为自己的国家具有足够的弹性来抵抗病毒传播。^[1]在2月24日,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Narendra Modi)和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还在印度举行了联合集会,有10万多人参加。特朗普坚称新冠病毒“在我们国家受到良好控制”。同样,英国卫生部部长麦特·汉考克(Matt Hancock)表示,英国人面临的风险很低,“我们已经做好充分准备”。在遏制这一流行病的一个月窗口期中,从世卫组织于2月11日首次发出警报到意大利于3月9日在全国实施封锁期间,国际社会由于对国内医疗保健系统充满信心或担心停止经济活动可能会影响本已疲弱的经济增长,因此未能采取有效措施,使疫情全球暴发不可避免。^[1]此外,在新冠病毒正在传播过程中,旨在“通过识别、减轻和管理风险,为紧急情况做准备”的世卫组织只能向主权国家提供建议,而却无权采取切实措施。面对疫情,国家之间并未形成有效的沟通合作机制,因而无法就疫情传播和防控问题达成较为统一的认识,无法以专家意见和科学知识为基础形成统一的信息。^[1]爱丁堡大学数学系副教授波波维奇(Nikola Popovic)强调,尽管主权国家在这场大流行中发挥了核心作用,但国家之间的合作在应对疫情带来的经济、政治和健康影响方面的重要性不容忽视。^[8]

再者,麻省理工学院的斯隆管理学院(MIT Sloan School of Management)副教授特隆德·乌恩海姆(Trond Undheim)指出,没有一个国家有充分的大流行准备计划(即政策、培训、接触者追踪软件、库存、重症监护病房的备用容量、呼吸机、实验室容量、医务人员、口罩、病毒检测试剂盒等)。尽管我们自认为当前社会很先进,但传统上具有前瞻性的机构、民族国家、智囊团、媒体或创新者,无论是公司还是初创企业,似乎都无法预见这种大流行。虽然比尔·盖茨(Bill Gates)曾发出过全球流行病在西方社会里肆虐的“灾难预言”,但也无法预见此次大流行的规模和影响。只有德国设置过与当前疫情相关的重大流行病情景。国际组织的情景演习或研

究大多是在十年前进行的,而且并不是全方位的努力。结果,医疗库存(超过仅限于大流行性流感预防的库存)已经过时或肯定不足。在大流行之前,无论批评家怎么说,都对大流行的影响缺乏真正的远见卓识。^{[9](92-136)}

总之,经济全球化进程只是为新冠病毒跨境传播提供了便利条件,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全球流动性的增强也加快了传播速度,但这并不是新冠疫情发展成如今肆虐全球局面的直接原因或根本原因,一些重要国家领导人对疫情的轻视或决策不当,国家之间的合作不足难辞其咎。此外,虽然人们知道无国界传染病是全球化的负面影响,但是此次疫情反映出全球都没有对这样的负面影响有足够的重视或准备。

二、疫情之下的国家主权与经济全球化

在新冠疫情全球多地暴发的几个月里,医疗设备短缺几乎垄断了西方公众的关注和讨论范围,短缺问题最终还是能解决的,它之所以如此突出,是因为关乎西方国家的抗疫能力以及经济自主能力,甚至被上升为国家主权安全问题。新冠疫情让大多数国家措手不及的时候,一些西方发达的资本主义大国一下子无法生产和供应足够的医疗用品,西方公众在错愕之中将矛头指向经济全球化,尤其是全球供应链,并认为经济全球化会威胁国家的经济自主能力和主权安全。社会学家里策认为,通常一个国家的主权基于其对人民的代表权,包括内部(例如收税)和外部(例如与其他国家打交道,参与战争等)集体行动的能力。^{[5](177)}在疫情之下,国家主权受到威胁主要是指生产供应方面的经济自主权受到影响、进而威胁国家的抗疫能力乃至主权安全。然而,更多的事实表明,经济全球化和国家的抗疫能力、经济自主能力以及国家主权之间并无真正冲突,经济全球化反而强化了国家的这些能力和国家主权。

(一)疫情对全球供应链的破坏引发西方关于主权安全的担忧

当代全球供应链的价值基础可以追溯至亚当·斯密(Adam Smith)提出的世界各国之间的全球经济专业化观点。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进一步指出,这种专业化是在比较优势“规律”基础上运作的,每个国家应该专注于自己最擅长的领域。^{[5](97)}通过全球自由贸易机制,每个国家都可以根据其特定(自然)技能来专门生产特定商品。自由贸易将自发地对资源(和商品)进行最佳利用和分配,并有利于所有消费者,因为他们能够通过市场自身的配置规律享受到许多“低成本产品”。^[10]因此,生产过程分成不同阶段并分散在不同国家,以提高生产效率并使成本最小化,从而形成了全球供应链的新模式。加拿大核安全委员会(Canadian Nuclear Safety Commission)通讯官布雷特·拜尔斯-兰(Brett Byers-Lane)指出,相比之下,旧的生产模式发生在国家或大陆边界内,供应主要针对国内市场。这种经济组织体系效率低下,成本相对较高,但总体上保留自主性或弹性。^[11]全球供应链则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效应,一国的生产过程受破坏往往对多国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

全球供应链因疫情在各国暴发和传播而中断或崩溃,造成一些疫情严重国家的医疗物资短缺。西方不少人认为,新冠疫情暴露了全球供应链的脆弱性,尤其是药品和医疗用品等关键产品的全球供应链的脆弱性。例如,德国政治学家乌尔里赫·门泽尔(Ulrich Menzel)指出,口罩和防护服在德国脱销,因为它们一直从中国进口,但是由于疫情暴发而在中国停止生产

或停止出口,并且德国药品生产处于危机之中,因为300种有效药品成分需要作为初级产品从中国进口。^[3]美国总统顾问彼得·纳瓦罗(Peter Navarro)主张,由新冠病毒引起的供应链中断是“警钟声”,表明美国太过依赖全球供应商提供必需品。于是他提出包括“购买美国货”命令的提案,该命令将强制限制来自外国供应商,特别是中国供应商的药品和医疗用品的进口。^[12]疫情在各国暴发期间,虽然东亚制造业巨头的供应中断备受重视,但欧美的供应中断也是不容忽视的。在纺织品方面,意大利是“欧洲工厂”的中心;美国是“北美工厂”的中心。整体而言,美国的商品和零部件生产中断会对北美其他国家造成严重影响。英国、德国、法国和意大利等欧洲主要供应商的商品和零部件的生产中断会给欧洲其他国家带来巨大影响。^{[13](62-64)}西方各国尤其担心核心领域全球供应链带来的依赖性会威胁到本国的经济自主能力、抗疫能力并进而威胁到主权的安全。

法国前外交大臣休伯特·韦德林(Hubert Védrine)发表了关于疫情的看法:毫无疑问,在新冠病毒危机之后,局势将恢复到“正常”状态,因为正是全球化使局势严重“失灵”。这种美式全球化是市场经济四十年的无限制扩张和“各种形式的主权无效化”的结果,产生了“准备不足、多重依赖、金融的不安全性、集体脆弱性以及生态保护的失责”,因此,美式全球化立即成为疫情严重性的根源。这位前社会主义部长变成了主权主义者,认为迫切要去全球化,从而以真正意义的主权国家为基础重整国际社会秩序,超越全球化价值链的畸变,限制生态灾难等。^[6]美国共和党参议员马尔科·卢比奥(Marco Rubio)积极地要求撤回部分关键的供应链,以最大限度地减少未来的中断,并在经济的战略领域重新建立生产能力。其结果可能是全球化力量的长期逆转以及政策学者罗伯特·阿特金森(Robert Atkinson)和迈克尔·林德(Michael Lind)提出的“国家发展主义”(national developmentalism)的恢复。^[11]

(二)疫情之下全球供应链与国家主权之间并无真正冲突

然而,尽管有这些“捍卫”主权、反对全球供应链的呼声,西方仍有不少观点指出,全球供应链及其体现的经济开放性和相互依存关系与国家抗疫能力和国家主权之间并非存在真正的冲突。

一个国家抗御流行病(以及战争等其他灾难)的能力的确要求其能够安全地获得必需品,但这未必与全球供应链形成矛盾,对此,英国《金融时报》的欧洲经济学评论员马丁·桑德布(Martin Sandbu)主要总结了三方面的原因。其一,国家可以像瑞士那样建立庞大的集体储备,包括食品、药品或医疗设备。除非政客们不愿意花钱储备可能永远不会使用的产品或保持储备库存充足。事实上,全球供应链能使库存产品价格更低,因此允许更大的储备规模,从而提升国家的抗疫能力。全球化也不会阻止政府要求私人企业保持一定程度的弹性。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新规定已迫使银行在其债务流失的情况下保持“库存”流动资产。同样,可以要求关键部门的企业保留必不可少的产品仓库(在英国,这种情况在不可预测的脱欧前夕就出现了)。这样的要求不是“反全球化”,因为即时生产和跨境供应链是两种截然不同的(通常是共存的)商业技术。再者,后者使前者更具负担或购买能力。^[4]其二,为保障国家面对危机时的自主能力,除了国家建立集体储备外,还可以使供应链多元化。全球供应链并不意味着供应链的每个环节都需要唯一的供应商。正如汽车制造商在2011年福岛(Fukushima)地震后

意识到,可以使零件、部件和其他投入的采购多样化,即拥有来自许多国家的多个供应商,而在一个国家遭受打击的情况下有应急后备。^[4]乔治·梅森大学(George Mason University)梅卡图斯中心(Mercatus Center)的美国经济与全球化计划署的高级研究员和联合主任丹尼尔·格里斯沃尔德(Daniel Griswold)指出,美国医疗产品的供应链已经多元化,而且并不过分依赖中国。中国供应链近期中断的主要根源是特朗普政府的关税战,而不是中国政府的任何政策。不应通过错误的“购买美国货”命令来阻止国际贸易,而应让美国企业自由决定如何开发替代供应商和建立库存以备不时之需。^[12]其三,合作伙伴国家共同组建生产或储备也是保障抗疫能力和主权安全的重要途径。虽然一些经济民族主义者甚至希望确保国内有能力生产所需的产品,而不是仅仅储存国外进口的产品。但是对于大多数国家而言,要在每种情况下都能自给自足,实在是太昂贵了。各国最好的选择不是食品、燃料、医用纺织品、呼吸器等一应俱全,而是与可信赖的合作伙伴国家共同组建生产或储备,以期在更大的跨国团体中生产的任何东西都将始终为所有成员使用。当然,这也是欧盟背后的重要观念基础。^[4]这三个方面从不同角度说明了危机之下保障国家主权的安全需要有保障供应安全的储备或措施,但是储备不足或措施不当不能归咎于全球供应链本身,相反,全球供应链反而能强化保障主权安全的储备或措施。

值得注意的是,面对医疗短缺,发达经济体事实上展示了较强的应急能力。美国国内制造商的反应速度惊人,帽衫工厂转向制造口罩;英国、德国和其他地方也迅速重组工厂以生产危机中所需的物品。因此,如果即使在政府计划不周的国家里,数周之后制造业能被转型调动起来,那么所谓的根本生产能力的缺乏也是一种幻想。^[4]新冠大流行显然使大多数国家措手不及。但是,通过更明智地利用全球化而不是背弃全球化,是可以增强国家自主能力或弹性的。

此外,面对全球供应链所谓的脆弱性或不稳定性,发达国家往往更有办法利用全球化保证其经济自主权。新冠疫情之下,全球经济中的不确定性正在增加,导致企业重新评估其全球供应链的商业模式,也出现了发达国家将生产部门迁回国内的各种报道。但是如前所述,这样回迁的价格太过昂贵了,于是另一种廉价的途径——自动化趋势或机器人使用——成为重要关注点。慕尼黑工业大学(Technische Universität München)国际经济学教授戴利亚·马林(Dalia Marin)指出,如今使用机器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便宜,这一事实强化了德国和其他富裕工业化国家将生产部门迁回国内的动机。其中的成本计算很简单:德国工人的薪水要比中国工人的薪水高得多。但是,德国机器人根本不要求任何工资,更不用说诸如医疗保险之类的社会福利或病假工资。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自动化一直在工业化国家里实施。当2008年危机袭来之时,德国已经有了足够的机器人来降低生产中人工成本的比例,自那时以来,利率与工资相比一直在下降,促进了机器人的使用,因为信贷购买变得更加便宜。过去的的数据表明,从低工资国家迁回生产部门可以使机器人的使用率增加76%。^[2]在德国,已经将其生产部门最充分回迁的行业是化学工业、金属工业以及电气和电子工业。机器人使用趋势将集中在最依赖全球价值链的那些部门。^[2]这种趋势意味着富裕工业国家工业生产的复兴,而这并非逆全球化趋势。慕尼黑的国家通讯员乌里·巴赫迈尔(Uli Bachmeier)认为,对于德国这

样的出口大国而言,全球化是不二选择。^[14]这很大程度上说明了发展中国家的低工资、低成本竞争不过发达国家的机器人,这种趋势很可能对许多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的增长构成重大威胁,因为它们迄今为止一直依赖成本效益好的中间产品的生产和出口。然而,幸运的是,因为机器人的使用也可能面临不确定性,从而阻碍投资的信心,所以机器人的使用在短期内不会不受控制地大幅增长。^[2]

(三)经济全球化实质增强了包括抗疫能力在内的国家实力并保障国家主权

虽然苏珊·斯特兰奇(Susan Strange)认为,技术和金融变革、民族经济加速融入一个单一的全球市场经济等都与民族国家的衰落有关;民族国家曾经控制着市场,但现在市场经常控制着民族国家,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大衰退(Great Recession)都是典型例子。^{[5](177)}然而,很大程度上,金融和技术领域问题的解决需要全球的协调和合作,并不是单靠某个民族国家就能解决的,这跟战胜新冠病毒需要全球合作是一样的道理。如果批评全球化的核心在于,全球化带来的各种大规模变化将导致我们失去对个人和集体生活的所有控制权,特别是民族国家的控制能力,而去全球化则在于收回控制权、恢复真正的国家主权,那么这似乎不太现实,因为世界各国很难回到自给自足、只关注国内市场的状态,而只有这种状态才能保证较全面的控制权。

事实上,回顾历史,经济全球化很大程度上是增强而非削弱了国家主权。泰洛斯智库强调,至少自19世纪60年代以来,主权国家组建各种国际组织并在紧密的国际合作框架内制定相应的规则和内部标准;实现邮件的全球分发;建立电报网络、铁路网络;统一重量、距离和时间的测量,制定知识产权法、健康标准以及外国劳工的权利等。实际上,这些国际组织及其伴随的全球化并没有破坏国家的权力,没有损害国家的主权,而是给国家提供了控制和指导工业化巨大动力的手段并带来了首批福利国家。工业全球化继续强化现代国家,自1970年以来所谓的世界范围的新自由主义丝毫没有中断这一进程。国际工业社会得以深化发展,虽然以严重的生态破坏为代价,但是却给人类的生活水平和预期寿命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增长。正是这个国际工业社会表明,主权国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大,因为它们已经融入了这个国际社会。再者,病毒和细菌并没有等到资本主义、现代化或工业化的到来才开始伤害人类;相反,正是工业化才能动员地球的资源,才有可能开始与病毒和细菌抗衡。^[6]正是国际工业社会的出现为人类提供了应对新冠病毒这种可怕流行病的手段,就像几十年来,它使对抗艾滋病或埃博拉病毒的斗争成为可能。

此外,正是因为国家实力的增强,许多国家才有能力做出使自己没那么容易受到“链式全球化”(chained globalization)影响的努力。乔治·华盛顿大学(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的政治科学家亨利·法瑞尔(Henry Farrell)列举了这方面的例子:中国正在将资源投入到本国的半导体行业中,以保护其免受美国的威胁;韩国试图建立自己的化工部门,以减少对日本的依赖;俄罗斯正开发全球金融网络替代品,并创建所谓的“主权互联网”,防止疑似的外国干预;欧盟成员国为使自己的企业免受美国的过度影响而作出各种努力。民族国家在某些领域还可通过切断联系来摆脱“链式全球化”的制约。例如,在国防采购方面,各国可以通过改变其部分供应链的路线来增加自主权,以最大限度地减少间谍和破坏活动的风险。例如,美国采

取措施以限制中国“危及”其军事技术的能力。^[15]

然而,法瑞尔强调,除非发生全面战争,否则各国政府将发现不可能重建在当今全球化出现之前盛行的独立民族经济。毕竟,如今的国家不仅仅是利用着全球金融系统、制造业供应链和信息网络,还依靠着它们。华盛顿或许能够重整其军事采购,但如果试图以类似的方式重塑消费经济,它将引起巨大的阻力和经济混乱,因为这将推翻整个工业,并大大提高普通百姓消费的商品价格。中国和美国等国之间的经济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很难在不造成混乱的情况下分离或“脱钩”。各个国家几乎或根本没有能力实现经济自给自足。在历史上的冷战期间,西方和苏联两大阵营的经济体几乎没有任何联系之处,因此几乎没有提供任何经济胁迫的机会(双方的决策者理解核武器的存在危险并制定了限制这种武器的战略)。当今的局势更加混乱,世界大国陷入了它们尚未完全理解的金融、贸易和信息网络之中,从而增加了犯下可能引发危险冲突的大错的风险。就像其他国家获得核武器却没有导致战争那样,华盛顿现在必须认识到,当其他国家采取措施保障主权安全时,美国是可以从中受益的,美国无须对这些措施作出过度反应。^[15]

事实上,经济全球化带来民族国家综合国力不同程度的增强,民族国家并不是失去了经济自主权或国家主权,而是有能力争取在关键领域上拥有一定的自主权,并形成彼此关联、彼此依存和彼此制衡的局面。民族国家无法解决的全球性难题,包括技术和金融变革带来的挑战、跨越国境的病毒、犯罪活动、恐怖主义乃至生态危机等,需要全球的合作协调或市场机制以外的治理机制来解决,而不应成为经济全球化削弱国家主权的理由。

三、新冠疫情与全球治理

根据前文可知,新冠大流行与不良的全球治理密不可分。当前的全球化经过三四十年的发展后,面临着不少的经济问题和随之而来的政治挑战。西方大多数人都不拒绝全球化本身,也承认全球化进程带来的不良副产品,并认为需要依靠全球治理来解决问题。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为新冠病毒传播带来了便利条件,而一些国家和地区疫情失控且抗疫举步维艰,除了国家领导人的轻视外,很大程度上是经济和人际交流的强度与国际公共机构的能力不匹配造成的。经济和人员交流非常频繁密切,但公共机构却无法达到管理这些频繁交流所需的全球治理水平。门泽尔指出,经济全球化并不是成功的保证,国际社会需要的不仅仅是在运输和通讯领域上取得使交易越来越快的技术进步,还需要保证主要国际公共利益的体制框架。^[3]事实上,经济已经全球化了,但是全球治理远未有效化、常态化。此次疫情就鲜明地突出了有效全球治理的缺位,主要体现为多边机构的治理失灵和国际政治中反多边主义的兴起,不利于全球抗疫行动,也不利于共同战胜新冠病毒这一全球性难题。新冠大流行的重大教训是迫切需要发展有效的全球治理,尽管现实可能困难重重。

(一) 多边机构的治理失灵与民族国家的独自抗疫

疫情之下,多边机构的无效治理与民族国家对多边机构的信心丧失充分体现在欧盟及其成员国的表现上。在无情的疫情面前,主导的西方机构,如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简称北约)和欧盟,变得越来越无助且“失灵”。德国《世界报》(Die Welt)华盛顿分社社长克莱门斯·韦尔金

(Clemens Wergin)指出,像德国这样的国家,依靠北约和欧盟等多边机构以及美国等重要盟友来保护本国人民。尽管呼吁采取国际解决方案,但全球化的公共卫生范式并未转化为应对大流行的准备措施。相比之下,国家表现出了治理和回应的意愿。鉴于大流行病的复杂性,有实际理由证明存在以国家为基础的解决方案的内在需求。^[16]

新冠大流行被视为欧洲自二战以来面临的最大危机,“欧洲共同体”信念在这场危机面前岌岌可危。^[17]欧洲各国在缺乏合作协调的情况下陷入独自抗疫的较为无序状态:一个国家有可能以“民族”和国家的更高利益为名,试图垄断药物生产的专利并剥夺其他国家这方面的专利,或者一国可以为自己的利益而截获发往另一国的货物,因为货物经由该国的一个机场过境。实际上,这种灾难性逻辑深深地破坏了国际法的原则、国家公共采购法的原则,使国家的不同部门相互冲突,并确保国家供应的名义加剧了全球短缺。^[6]在灾难面前,民族国家对多边机构和多边合作失去信心,陷入孤独抗疫甚至彼此排斥状态,这跟多边机构的治理失效脱不了关系。

此外,正如前文所分析那样,世卫组织资源匮乏,缺乏权威,无法在全球范围内起到充分协调的作用。为了挽救分裂的国际体系,国际社会必须反思解决全球危机的现有框架并加强国际组织在紧急情况中的领导作用。特别是,世卫组织应该在当前的新冠大流行中起带头作用,而各国应根据世卫组织的建议执行严格的政策。现在迫切需要在世卫组织的领导下建立一个联合性部长级委员会作为决策机构,通过合作努力遏制该病毒,而不是每个国家孤军奋战。^[1]

(二)国际政治的“反多边主义转向”与新冠疫情作为全球性问题的难解性

近年来,国际政治出现“反多边主义转向”,但却有越来越多的全球性问题只能通过多边合作解决,这正是新冠疫情暴发的背景。印度的经济学家和院士迪帕克·纳亚(Deepak Nayyar)指出,全球范围内,在民粹主义或沙文主义情绪的抬头下,对全球化的政治抵制以复兴的民族主义形式出现了。在工业化国家,尤其是美国和欧洲,民族主义—民粹主义政党或极右翼的仇外民粹主义领导人利用的是公众对开放性移民和贸易夺走就业岗位的恐惧。在发展中国家,民族主义—民粹主义政党或领导人利用宗教信仰、种族分歧或猖獗的腐败挑战或驱逐现任政府。全世界这种有毒的民族主义都试图利用由全球化带来的不平等结果所创造的政治空间。^[18]

4月14日,特朗普宣布将冻结世卫组织的资金,理由是他认为世卫组织偏向中国。美国政府这种态度背后的实质是对多边主义的完全拒绝。在美国,经济全球化方面的共识被淡化了,因为美国东北部工业城市的大型部门在去工业化进程中被边缘化了。尽管与技术和服务相关的其他经济部门在经济全球化中大为受益,但在选举经济中历来重要的工业部门大幅衰落。“美国优先”的口号在这些社会部门,尤其是美国民族主义右翼中得到了回应。特朗普政府下的政治策略家斯蒂夫·班农(Steve Bannon)和经济民族主义推进者纳瓦罗主张拒绝经济全球化和多边主义,认为一方面,经济全球化削弱了美国;另一方面,在多边主义之下国际组织仅仅是利用美国的资源来造福世界的其他地区。^[19]实际上,这些主张自2017年以来一直指导着美国的外交政策。特朗普正是基于这样的前提拒绝了世卫组织,还撤走了大部分资助,因

此阻止了任何旨在通过多方合作解决新冠病毒问题的方案。也有分析指出,谴责世卫组织以中国为中心而不是迅速采取行动的指控是削弱世卫组织形象并使其行动不合法的手段。^[19]斯洛文尼亚社会学家、哲学家与文化批判家斯拉沃热·齐泽克(Slavoj Žižek)指出,虽然世卫组织有其问题,但是全球协调的重要模式仍是世卫组织,从中人们听到的极少是常见的官僚套话或废话,而是没有惊慌的确切警告。此类组织应被赋予更多的执行权,未来仍然迫切需要“类似世卫组织的机构”,但却是比其更好的机构。^{[20](41)}

像新冠大流行这样的无国界传染病跟全球气候变化、恐怖主义等都是全球性问题,不能靠某个民族国家单独处理。如果世界希望战胜无国界的新冠传染病,那么各国最终将需要在抗疫方面相互合作。如果不这样做,那么新冠病毒虽然会在一个地方被击败,却可能在另一个地方重新出现,并且摧毁前者所取得的任何胜利。幸运的是,国际社会仍有不少支持合作抗疫的积极例子。在新冠病毒出现后的几周内,中国科学家对它的基因组进行了测序,并与全世界分享了测序结果。这使得世界上每个国家都可以进行检测以确定阳性病例并开始研发疫苗。^[21]高效的测序可以归功于我们前所未有的技术、知识和通信全球化程度,后者又得益于不断扩大的经济交流。如果各国不共享信息,那么绝大多数人在应对疫情方面将面临更多困难。在特朗普宣布撤资之后,芬兰以增加对世卫组织的资金作为回应。同一周,在虚拟的西方七国首脑会议(G-7 Summit)上,其他西方领导人也表示了对世卫组织的强烈支持。盖茨基金会还宣布追加1.5亿美元的捐款。中国也向世卫组织承诺捐款。^{[9](52)}

以色列总理本杰明·内塔尼亚胡(Benjamin Netanyahu)在应对新冠疫情暴发造成的威胁时,立即向巴勒斯坦当局提供了帮助和协调,这因为如下简单事实:在当地不可能区分犹太人和巴勒斯坦人,如果其中一方受影响,另一方也会不可避免地遭受苦难。这是我们应该转化为政治的现实——现在是时候放弃“美国(或其他任何人)优先”的口号了。正如半个世纪前的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所说:“我们可能都曾乘坐过不同的船,但现在我们在同一条船上了。”^{[20](14-15)}英国《卫报》柏林分社社长菲利普·奥尔特曼(Philip Oltermann)指出,特朗普向总部位于图宾根的生物制药公司“丘尔瓦克”(CureVac)提供了10亿美元,以获得“仅供美国使用的”有效的新冠病毒疫苗。德国卫生部长詹斯·斯潘(Jens Spahn)表示,特朗普政府对“丘尔瓦克”的收购“不在讨论范围”。“丘尔瓦克”只会“为整个世界而不是单个国家/地区”开发疫苗。^[22]

比利时外交官拉乌尔·德尔科德(Raoul Delcorde)和鲁汶天主教大学(Université catholique de Louvain)研究员文森特·劳德瑞(Vincent Laborderie)共同指出,在全球化的世界中,各国应在尊重主权前提下加强合作关系,全球合作关系跟国家主权一样重要。未能考虑到这一现实才是当前疫情灾难的根源。^[23]经济全球化增强了国家主权,但这并不意味着单个国家就拥有了对内对外的全面控制权并能独善其身,因为事实是,每个国家在工业化或现代化发展过程中还面临着诸如环境污染、传染病等在当前快速全球化阶段之前就出现的、需要全球协作才能解决的世界性难题。如果任由反多边主义发展,只会使全球性问题陷入积重难返的困境。亨利·基辛格(Henry A. Kissinger)强调,没有任何国家,包括美国,可以通过纯粹的国家层面的努力来抗疫,面对当前的抗疫必须伴随全球规模的愿景和共同计划。为了避免或缓解未来危机

的影响,需要达成共识的全球政策。正如“二战”后那样,世界意识到要避免进一步的破坏就需要对话与合作,现在需要包括所有人在内的新的全球共识,才有可能协调地方和全球利益,因为这最终是与无国界的共同敌人作斗争。^[24]

(三) 抗疫的教训与全球治理的理想和现实

西方不少评论似乎都指出全球化既有作为不可磨灭的事实的一面,例如经济全球化,又有能被管理的可适应性一面,例如全球治理。因此新冠大流行及抗疫过程带来的教训就是,人们如何学会去发现、控制和管理作为全球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的风险。要吸取这个教训,就要明白当下合作和领导能力匮乏的情况,并呼吁可以调节经济、共同应对全球性难题、并在必要时限制民族国家主权的全球治理。法国国际关系领域的著名专家伯特兰·巴迪亚(Bertrand Badie)指出,有效的全球治理必须强调如下三点:一是已变为共有的资产或现在共同面临的威胁需要通过国际社会的合作协调来治理;二是重塑“他者性”(otherness),超越过时的敌友关系,代之以“伙伴”(partner)关系的观点,即促成伙伴的成功才能保护自身的利益;三是重新全面投入公共支出,以支持相互依存关系的迫切需要为基础,而不是以国家之间彼此竞争的“威斯特伐利亚主权”(Westphalian Paradigm)原则为基准,其中威斯特伐利亚主权或国家主权是国际法中的一个原则,即每个国家对其领土拥有专属主权。^[25]

全球治理是大多数希望世界持续和平发展的人的迫切愿望,然而,全球治理所面对的现实似乎并不太理想。全球化带来的民族国家内部的不平等结果一直是一些政客执意不放的话题。奥地利经济中心(Austrian Economics Center)的研究与拓展协调员兼哈耶克研究所(Hayek Institute)的董事会成员凯·维斯(Kai Weiss)按照国家在全球化中的发展情况将世界分成三类。第一类是北美和西欧,代表着全球化自由贸易的精髓,也体现全球化的缺点,是“全面”全球化的典型。然而,这些国家精英阶层和中下阶层在全球化中的获益程度并不相同,去工业化、移民和制造业岗位流失似乎一直是挥之不去的阴影。第二类是世界上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全球化的经济利益对它们而言是不可否认的,但社会动荡也是一个问题:人口移民到较发达的经济体而导致人口减少,行业位于利润较低的价值链低端层次上,传统文化分歧变成政治分界线。东欧国家也可能会属于此类。第三类包括日本、韩国、挪威和瑞士等,其中日本是典型,中国比起其他两类更接近第三类。日本就对外投资、出口和旅游等而言肯定是深度融入全球化的国家,但是它属于“轻”全球化的代表,因为日本更为注重保护国内中小企业,而且在移民方面较为保守。^[26]笼统地说全球化对所有人都有益,似乎较难为全球治理集结政治意愿和成本,如何解释全球化过程具有规范性并具体分析其对不同参与者的不同利益可能是首要问题。

此外,如果国际主义者(通常是因为气候变化而反全球化的中产阶级)和民粹主义方面对全球化的批评性话语继续流行,那么政治家为全球化框架设定手段、规则和制度的意愿就会减弱。如果没有全球治理,全球化本身及其经济效益可能会失去影响。还有不少人认为全球化不再具有保护力量。巴赫迈尔强调,美国在特朗普领导下依靠孤立主义,西方对中国也不乏顾虑,而欧洲则矛盾重重。目前还没有一项能与全球化的负面后果作斗争、并能关注到每个人的繁荣发展的强有力政策。^[14]西方尤其表达了对全球治理的积极愿望,但是现实似乎并

不太积极,未来更是不确定的。曾获得英国皇家统计协会(Royal Statistical Society)年度新闻奖的记者乔恩·布鲁姆(Jonty Bloom)指出,疫情之后,世界可能会像 1918 年以后,面临的是国际组织的日渐衰弱,民族主义、贸易保护主义的增长和经济萧条的出现。或者,世界也可能像 1945 年之后那样,选择合作和国际主义,例如布雷顿森林协议和体系、马歇尔计划、联合国以及《关税与贸易总协定》。^[27]

西方有不少人认为,无国界疾病是经济全球化的不良副作用,经济全球化很可能加快了新冠病毒这种无国界传染病的传播速度,但是疫情在一些国家的失控局面并不能归咎于经济全球化,国家领导人的轻视和决策不当以及国际组织的低效和不良治理才是根源。经济全球化,特别是全球供应链与国家的抗疫能力和国家主权之间并无真正冲突,前者反而是增强后者的重要因素。有效全球治理的缺位,全球化的规模与全球治理能力的不匹配,特别是多边机构的治理失灵和国际反多边主义的兴起,是新冠肆虐全球的重要根源,也是全球抗疫艰难曲折的原因。人类要想共同战胜病毒,巩固经济全球化的成果并形成应对无国界疾病、气候变化等全球性问题的良好机制,就必须加强国际合作、强化多边主义并改善全球治理,否则疫情之后,人类可能又要面临下一个全球性问题的侵害。

参考文献

- [1] Hans Yue Zhu.COVID-19:Turning Point for Globalization?[J].YaleGlobal Online, 21 April 2020.
- [2] Dalia Marin.Globalisierung unter Druck: Deutschland holt die Industrie nach Hause [J].Der SPIEGEL, 6 May 2020.
- [3] Ulrich Menzel.Der Corona-Schock Die finale Entzauberung der Globalisierung[J].Blätter, April 2020.
- [4] M. Sandbu. Globalisation and national resilience can coexist despite covid-19[N]. FT.Com, 1 April 2020.
- [5] George Ritzer and Paul Dean. Globalization: the Essentials [M].New York · London: John Wiley & Sons Ltd, 2019.
- [6] Telos et Blaise Wilfert.La mondialisation est la solution pour lutter contre le coronavirus[J].Slate, 20 avril 2020.
- [7] Frederic Spohr und Armin Reinartz.Die Globalisierung geht weiter – unter Chinas Führung[J].Capital, 27 April 2020.
- [8] Nikola Popovic.The State and Globalization during Covid-19[J].Modern Diplomacy, 13 April 2020.
- [9] Trond Undheim.Pandemic Aftermath: How Coronavirus Changes Global Society [M].Texas: Atmosphere Press, 2020.
- [10] Hans Cova.Coronavirus: les limites structurelles de la mondialisation néolibérale[J].PRESSE-TOI A GAUCHE! 21 avril 2020.
- [11] Brett Byers-Lane.Will globalization fall victim to the coronavirus? Sean Speer in the National Post[J].CE Think Tank Newswire, 20 March 2020.
- [12] Daniel Griswold.The Coronavirus Should Not Prompt Us to Rethink Globalization[J].CE Think Tank Newswire, 3 April 2020.
- [13] Richard Baldwin and Eiichi Tomiura.Thinking ahead about the trade impact of COVID-19, In Richard Baldwin and Beatrice Weder di Mauro (eds.) Economics in the Time of COVID-19[M].London: CEPR Press, 2020.
- [14] Uli Bachmeier.Die Corona-Krise entzaubert die Globalisierung[N].Augsburger Allgemeine, 8 April 2020.

- [15] Henry Farrell; Abraham L. Newman. Chained to Globalization[J]. Foreign Affairs, Jan/Feb 2020.
- [16] Clemens Wergin. Die Pandemie zeigt, wie verletzlich uns die Globalisierung macht[N]. Die Welt, 16 April 2020.
- [17] R. Baroud & R. Rubeo. Will the Coronavirus Change the World?[N]. Dissident Voice, Santa Rosa: Newstex. 27 April 2020.
- [18] Deepak Nayyar. Failing health of globalization: Covid-19 blow to a stressed order[N]. MINT, 12 March 2020.
- [19] Translated by ContentEngine, L. L. C. Chronicle from Day 1: Coronavirus Recognizes Borders[J]. CE Noticias Financieras, 24 April 2020.
- [20] Slavoj Zizek, PANDEMIC! COVID-19 Shakes the World[M]. New York • London: OR Books, 2020.
- [21] Translated by ContentEngine, L. L. C. The coronavirus pandemic is the daughter of globalization: Will it be its savior or its gravedigger?[J]. CE Noticias Financieras, 12 April 2020.
- [22] Philip Oltermann. Trump 'Offers Large Sums' for Exclusive US Access to Coronavirus Vaccine[N]. The Guardian, 15 March 2020.
- [23] Raoul Delcorde & Vincent Laborderie. Repenser la mondialisation à la lumière du coronavirus[N]. L'Echo, 16 avril 2020.
- [24] Henry A. Kissinger. The Coronavirus Pandemic Will Forever Alter the World Order[J].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3 April 2020.
- [25] Bertrand Badie. L'épidémie de coronavirus (COVID-19): un catalyseur vers l'acte II de la mondialisation?[J]. The OECD Forum Network, 3 April 2020.
- [26] Kai Weiss. A New Version of Globalization May Emerge[J]. CE Think Tank Newswire, 18 April 2020.
- [27] Jonty Bloom. Will coronavirus reverse globalisation?[N]. BBC News, 2 April 2020.

[责任编辑 李英武]

ABSTRACTS

On the Uncertainty of Trump Administration's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LIU Sheng-xiang ZHANG Peng GAO Han · 3 ·

Abstract: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rump administration has been generally determined since Trump took office. Now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world are experiencing the shock wave of Trump Doctrine. Because of the special status and influence of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world, Trump's every move affects the nerves of the world. Trump's Zero Political Experience, Frequent changes of government leaders, the game competitiveness of Trump government's strategic security thinking, and Democratic pressure on Investigation of Trump's Illegality, and etc. lead to the great uncertainty of its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which will damage the reputa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weaken its soft power, affect the implementation of its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and destroy the existing international rules and stabilit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ot only that, in the future, the promotion of Trump Administration's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will be influenced and constrained by two major factors at home and abroad. The uncertainty of Trump administration's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will continue. The United States is the source of world turbulence and has been from the builder and defender to the destroyer of the world order and rules during Trump's period. Trump may be the terminator of the world order dominated by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West, which China should be fully prepared for.

Key Words: Trump Administration; The United States;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Uncertainty; Cause; Impact; Preparation

The Sino-U.S. Game of Global Debt Governance and China's Policy Analysis

WANG Jin-qiang HUANG Mei-bo · 20 ·

Abstract: The debt problem of developing countries has a long history. Although the debt problem is essentially an economic problem, the resolution of the debt problem is closely related to international politics. Debt relief is regarded as an important tool to intervene, influence or even shape the economic policies and agendas of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it is also regarded as an important area of competition among countries in the developing world. Affected by the COVID19, the economies of developing countries have been hit hard, causing the debt situation of some countries to deteriorate rapidly. Since emerging countries such as China have become the main creditors of developing countries, the United States has established commanding heights through debt relief initiatives via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organizations. On the other hand, the United States has exerted political pressure on China's debt relief by building a united front of "anti-debt group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More importantly, the United States implements double standards in supporting debt relief, and requires China's debt relief as a prerequisite for relaxing the debt-servicing period of the countries concerned. This discriminatory debt relief policy will not only increase China's external debt risk and weaken China's economic relations with developing countries, but also provide other countries, especially Western countries, with a new excuse to attack China. As a result, China will suffer from double political pressure from some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the United States.

Key Words: COVID-19; Sovereign Debt; Game; China; The United States

The Evolu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Understanding of China's Strategic Role: Comparative Analysis Based on Seventeen U.S.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Reports

WANG Xin-ying · 36 ·

Abstract: The United States' understanding of China's strategic role is a dynamic process of constant development and change, and presents distinct characteristics in different periods, which is directly reflected in the series of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reports issued by the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On the basis of a systematic review of its evolution process, this paper reveals the reasons leading to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s strategic role in United States' understanding: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in which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are located, the external environment brought about by the evolu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pattern, and the internal reasons for the adjustm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national strategy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domestic political ecology, and the direct impetus of the change in the balance of power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The United States' understanding of China's strategic role is characterized by continuity and periodic features, unilateralism and multilateralism, and also reflects the two-sided strategy of dialogue, engagement and containment that the United States has always adhered to.

Key Words: China's Strategic Role; U.S.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The United States' Strategy to China; Understanding of Strategic Role; Sino-U.S.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Pattern

The U.S. De-coupling Strategy against China and Its Counter Measures under the Global Shock of COVID-19

WANG Da LI Zheng · 47 ·

Abstract: Under the catalysis of the global public health crisis, the trend of the United States accelerating its conscious de-coupling from China has become apparent increasingly. Trump administration's eagerness to divert domestic conflicts and pressures is the direct reason of the de-coupling. It has been manifested in the facts that the U.S. government stigmatized China's fight against the epidemic to promote an escalation of the information war against China, accelerated investment de-coupling with China in the name of national security, curbed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high-tech industry to achieve technology de-coupling, and implemented sanctions aiming at Sino-U.S. financial de-coupling. The inherent conflict between China's rise and the U.S.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which is based on unipolar thinking is the fundamental cause of the U.S. suppressing China. Recently, there have been three obvious changes in the U.S. pressure on China. The accelerated de-coupling has put China in a dilemma upon key industries and fields in short term. China's export-oriented mode of economic growth faces pressure for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Furthermore, the U.S. will continue press China in areas such as human rights and ideology. To be fully prepared for the U.S. competitive strategy, China has to act at both strategic and tactical levels. Currently, China should take the lead in resuming production and production, keep on continuous independent innovation, deepen regional cooperation, and promote mutual benefit and win-win outcome. In the long run, only by integrating deeply into world economy, can China avoid the risk of being marginalized by the U.S.

Key Words: COVID-19 Crisis; Sino-U.S. Relations; De-coupling; Whole-of-Government Approach to China;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Effective Globalization and Ineffective Global Governance: New Reflections from Western Scholars in the Context of the COVID-19 Pandemic

LING Fei-xia · 63 ·

Abstract: The fact that the COVID-19 spreads rapidly and causes huge damage in the world has triggered a fierce debate about globalization in the

West. Although the COVID-19 as a borderless disease is regarded as a negative effect of globalization, most western commentaries refrain from blaming the outbreak of the pandemic directly on economic globalization, and point out the root causes such as some leaders' improper decision-making and the failed governance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While the public are immersed in the collapse of global supply chains, medical shortages and their threats to national sovereignty, most commentaries from the West, in defense of economic globalization, believe that economic globalization will not be in conflict with national economic autonomy, national capabilities to fight the COVID-19 or even state sovereignty, but instead enhances these capabilities and state sovereignty. At the same time, these commentaries emphasize the mismatch between the enormous scale of changes and global challenges brought by economic globalization and the level of global governance. The absence of effective global governance cannot consolidate and guarantee the achievements of economic globalization. The failed governance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and the rise of multilateralism are not conducive to the global fight against the COVID-19, and will stop the world from overcoming global problems such as the COVID-19. If the world is to walk out from the haze of the pandemic and to prepare for future global challenges, it is urgent to achieve effective global governance.

Key Words: COVID-19 Pandemic; Economic Globalization; State Sovereignty; Global Governance; Anti-multilateralism

From Global Governance, National Governance, to Local Governance: Three-tier Governance and Their Interaction in COVID-19 Response FENG Zheng · 76 ·

Abstract: The outbreak and rapid spread of COVID-19 has made public health governance beyond the scope of local health governance, and has evolved into national and even global public health events. The response to COVID-19 is a typical three-tier governance process: global governance, national governance, and local governance have all played important roles, and positive interactions have been achieved in the governance process. In the response to major disease, global governance has become an authoritative provider of international public health products; national governance is the unified commander of resource mobilization and circulation control; local governance is at the front-line of crisis management and is the protector of residents. China's practice in responding to COVID-19 has shown that the three levels of governance have maintained a positive interactive relationship: WHO, the Chinese government, local governments and the community have worked closely together and actively, to maximize the outstanding governance of the disease.

Key Words: COVID-19; Global Governance; National Governance; Local Governance; Interaction

Coordination and Cooperation of Sino-Japanese Marine Affairs in the Pan-ocean Era

ZHANG Jing-quan WANG Lu DONG Yi · 86 ·

Abstract: At present, the "sea-land conflict theory" no longer adapts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global ocean situation, and is replaced by "pan-oceanic theory" with the globalization of ocean affairs, which means the pan-ocean era has been arrived. In the pan-ocean era, the coordination and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in maritime affairs are full of new opportunities and motivations, which should be actively carried out to maximize the benefits of the ocean. In fact, China and Japan have carried out certain coordination and cooperation in specific areas such as marine cooperation mechanisms, marine economy, marin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arine security, marin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marine search and rescue. However, existing cooperations have problems such as too concentrated areas of cooperation, less bilateral direct cooperation, and sensitivity and vulnerability of cooperation. In the future, China and Japan have ample room for improvement in existing areas of cooperation. In addition, China and Japan have new spaces for coordination and cooperation in the areas of docking the "Belt and Road" and Japan's maritime strategy, bilateral maritime cooperation and third-party maritime cooperation, Arctic affairs, maritime cultural cooperation, and etc.

Key Words: Pan-ocean Era; Sino-Japanese Relations; Marine Affairs; Coordination; Cooperation

The Impact of the Economic Risk of Central Asian Countries on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TONG Wei ZHANG Ju-ying · 100 ·

Abstract: The Central Asian countries have long and close economic and trade cooperation with China. After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was put forward, the Central Asian countries have actively participated in the promotion of the initiative and have carried out deep cooperation with China in many fields, such as trade, investment and finance. But the economic risks of the Central Asian countries, such as vulnerability, imbalance and external dependence, bring about some challenges to the bilateral and multilateral cooperation under the initiative. Therefore, in the process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China should be neither blindly optimistic, which will make China's enterprises suffer from unnecessary investment risks and losses, nor enlarging the economic risks of Central Asia countries and dampening the enthusiasm of Chinese enterprises to go out. China should continuously strengthen the construction of cooperation mechanism with Central Asian countries, change the dominance of western countries over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ules, expand cooperation areas, promot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cooperation, improve the efficiency and level of cooperation between Central Asian countries and China, improve the convenience and safety of Chinese enterprises' investment, realize the common prosperity of Central Asian countries and China, and thus impel a higher level of cooperation between Central Asia countries and China under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Key Words: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Central Asian Countries; Economic Risks; Transmission; Avoidance

The Dilemma and Solution of the Trilateral Cooperation

GU Wei · 116 ·

Abstract: Trilateral cooperation, as the basic form of multilateral cooperation, emphasizes participation of all three parties, the ideas and goals of cooperation and institutionalization operation. Increasing the benefits of trilateral cooperation can make positive influence on bilateral relations. Or reduce the cost of trilateral cooperation to transfer internal contradiction's attention. Both can be contributed to attract nations participating trilateral cooperation. Depending on different nation's strength combination, trilateral cooperation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types: balance of power, dual strong, single strong. A nation that want to build trilateral cooperation needs to make clear of the type and the role played, choose appropriate objects, set up the cooperation's field, topic, project. These can give a breakthrough on trilateral cooperation's dilemma and build a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rilateral cooperation. Trilateral cooperation is not exactly the same as third-party market cooperation which can be catalyst for the trilateral cooperation.

Key Words: Trilateral Cooperation; Trilateral Cost; Internal Contradiction; China-Japan-ROK; China-Mongolia-Russia; U.S.-Japan-ROK; Third-party Market Cooperation